

論蘇軾的創作經驗

徐中玉 著



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徐中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徐中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解放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⁵/₈印张 102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本

统一书号: 10135·006 定价: 0.42元

前 言

北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全能文艺家。他的散文、诗、词、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在各个领域内占有突出的地位。在长期创作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艺术经验，通过诗文、题跋、书简、笔记、谈话等形式，直接或间接给后人留下大量精采的材料。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材料，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探索艺术创作规律，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本小书里的文章，都是在粉碎万恶的“四人帮”、文艺、学术界重见生气之后的最近一年多时间内写成的。研究苏轼的创作经验，鄙意还在揭示其中合乎科学、用之有效、具有规律性的部分，期望它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有所帮助。重点在此，所以对苏轼思想、作品中某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或弱点就未多说，我以为苛求于他固不对，重复说些阶级局限、历史局限之类的空话实在也尽可不必。鲁迅说得好：“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1933年9月11日）我们今天读苏轼的作品可以如此，读他的经验之谈，研究他的创作经验，更可以如此。

整理研究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方

面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在我还只是初步尝试，粗疏不合之处肯定不少。文章都单独发表过，合看时有些地方嫌重复，但也有些是从不同问题或不同角度来谈的，引文偶有重出之故在此。这次集印时对题目作了些改动，文字基本照旧。自知学浅，不过聊贡愚者之一得，敬请读者指教。

徐 中 玉

一九八一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 一、言必中当世之过…………… (1)
 - 1、作文之要，在有意而言
 - 2、言必中当世之过
 - 3、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
 - 4、论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 二、随物赋形…………… (18)
 - 1、“随物赋形”就是美
 - 2、美亦可以数取
 - 3、尽物之变，姿态横生
 - 4、画马不独画马皮
 - 5、造乎理者，才能画物之妙，得物之真
- 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33)
 - 1、要“清新”，不要“务新”
 - 2、迂怪艰僻，不足为训
 - 3、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 4、美好出艰难
- 四、妙算毫厘得天契…………… (47)
 - 1、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 2、有数存焉于其间
 - 3、美可以数取，不能求精于数外

五、胸有成竹…………… (62)

- 1、意在笔先
- 2、形似、神似与常理的统一
- 3、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 4、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 5、后人对“胸有成竹”的议论

六、技道两进…………… (79)

- 1、写物之功
- 2、千变万化，有必然之理
- 3、理从何来
- 4、技道必须两进

七、自是一家…………… (92)

- 1、有意为之的“自是一家”说
- 2、“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 3、如何始能“自是一家”

八、品目高下，付之众口…………… (106)

- 1、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
- 2、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
- 3、鉴赏之精，在有深广阅历
- 4、知其所长而不知其弊，不可谓善学

九、如何作文…………… (123)

- 1、必须有意乎救时、济世之实用
- 2、三先三后
- 3、多读多作多改

十、“八面受敌”的读书法…………… (131)

- 1、读些什么
- 2、怎样读

附录：略谈“四人帮”的反对苏轼…………… (139)

言必中当世之过

一、作文之要，在有意而言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大家知道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甚至绘画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其实他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表现也绝不逊色，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有许多例证，说明最好的理论批评家往往就是大作家本人。在外国，歌德、巴尔扎克、福楼拜等都在他们的谈话、回忆录、书信或专题的论文中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批评资料，正因为这些都是他们长年累月的甘苦、经验之谈，所以使后人特别感到珍贵、亲切。苏轼也就是这样一位名家，他并无专门的文论著作，但保留在他部分诗歌、散文，尤其序跋、书简中的文艺见解，的确是我们文艺宝库中一笔极有价值的财富。

这中间，“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一种非常光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仍能有不小启发。

在文学创作上，苏轼有个明确的思想，即“有意而言”，认为这是“作文之要”。他说：“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乎人。”（《策总叙》）他告诉不远数千里去僇耳向他求教作文之法的葛延之：“僇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

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掇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掇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

作文要“有意而言”，一般说，这种思想前人早已有过，不能算是独创。但苏轼把它郑重地提出来，在当时却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一主张针对当时的不良文风，体现着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是有其现实斗争的意义的。他曾明白指出：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模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

（《谢欧阳内翰书》）

这就是说，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是反对晚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而主张“复古”的，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原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当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依然走的邪道。旧弊也好，新弊也好，追求的都不是他认为应该追求、值得注意的东西，作者们尽写些浮文废话，在他看来，毛病即在其中没有“意”。没有“意”，就写不出好的作品，不能成为佳

作。

“浮巧轻媚”与“迂奇怪僻”的东西其中是否没有任何意思呢？当然不是。纯然只有形式而无任何思想内容的诗文是不存在的。苏轼所讲的“意”，并非指随便什么意思，实有其特定的含义。看他自己所说：

今览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答俞括书》）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固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六一居士集叙》）

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慷慨，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人之士。（《答乔舍人启》）

这几段话说得很明白，他赞赏的文章是那些能够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谏的；是以华采为末，体用为本的；是能酌古御今，存心济世的。简言之，“救时”和“济世”，就是他对作文所要求的“意”。文章中确有这样的思想内容，便是“有意而言”，否则，便没有意义。“有意而言”，有时他也称之“有为而作”。

苏轼为什么会主张这样的“意”呢？

他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当时社会表面上好象太平、繁荣，实际由于豪强兼并，边备松弛，官僚机构臃肿无能，人民生活异常困苦，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内外危机就将爆发。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苏轼，对当时政治形势了解较多，比一般人较早看出了问题，同时由于所属阶层不免受到

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排挤，也有改革的要求。对于具有这种识见和要求的苏轼来说，自然不会满意西昆体和迂奇怪僻的文风，而要求革新诗文，使文艺创作密切联系现实，在社会革新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自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如上所说，这都不是偶然的。当然，他所谓齐物，所谓济时，无非想为北宋王朝未雨绸缪，挽救危机。可是由于他毕竟不失为一个改革家，基本上是要抑制大地主兼并势力的，在历任地方官时，在救灾救荒，赈粮施药，兴修水利，整饬军纪，免除赋税，发展生产等方面都作出过一定成绩。他“为君父惜民”（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是实，对人民毕竟还是有所顾惜，同残民厚君者有明显区别，所以，他的“救时”、“济世”之“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说，不可否认有一定的进步性。

苏轼以“有意而言”教人，也以“有意而言”自乐。他曾这样告诉刘景文：“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引其语。）他的议论不一定都对，但确是侃侃而谈，非常慷慨，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这些话又是要用来“救时”、“济世”的，这使他感到气壮，也觉得畅快。

二、言必中当世之过

作文要有“救时”、“济世”之意，当然不错，但究应说些什么话，才算有救时、济世的作用？苏轼牢牢记住了父亲苏洵告诉他的话：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鳧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鳧绎先生诗集叙》）

苏轼这里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而且这种言还必须“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确实可以作为他所说“救时”、“济世”的注脚。如果口上说要救时、济世，却未曾看准当世之过究在哪里，以致说得不中肯，或者看到了而不敢说，这怎么能救时、济世呢？如果想要救时、济世，当世之过究在那里也说对了，但又只是抽象地、原则地“微言高论”一番，或者把国家社会、把别人埋怨痛骂一顿，而提不出确凿可以救饥治病的建设性意见或办法来，这又怎么就是救时、济世呢？

“言必中当世之过”实质上就是今天所说的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分明已经积贫积弱，危机四伏，还要人们高喊形势一派大好，北宋当时一些地主保守派是这样干的，过去林彪、“四人帮”一伙也是这样干的，他们都决不许人民揭露“当世之过”。讳疾忌医，自然只能使疾病加重，导致不可救药。这种搞法，根本谈不到什么救时、济世。

但“言必中当世之过”，也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反复论难”，具体分析，找出切实可行，纠正过错的办法，才能

包括救时、济世的全部工作。能够言必中当世之过，看到了症结所在，比之那种只知保全一身一家，问以国家大事，却四顾茫然，言不中肯，当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揭露本身不应是终极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国家社会的毛病想法切实治好，使得人民大众真正幸福、高尚起来。客观上还没有得到治好了病的效果，是还不能说已尽了救时、济世之责的。联系当前我们自己的体会，就不难感到苏轼当时讲的这些话，不但合理、完整，而且也很深刻。

作文有救时、济世之心，还要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出了切实有效的救时、济世之法，是否这样就一定能成为天下之至文了呢？光有某种正确的思想，某种正当的责任感和洞察力，是否就能取得强有力的艺术效果呢？还是不一定的。文学作品寓理于情，没有真理不行；光有真理而缺乏一股不得不发的激情，作品不动人，这也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以屈原为例。他的《离骚》是怎样写出来的？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谀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怨思而作《离骚》。”“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史记·屈原传》）屈原的全部作品里都汹涌着一股强烈的激情，正是这股激情驱使他写出了他的作品。他不能不写，也不能不这样来写，他的作品是震撼人心的。

以司马迁为例。大家知道他是“发愤著书”说的先驱，他自己的《史记》也是发愤著成的。他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自

己呢，在《史记》的草创过程中，触犯皇帝闯了大祸，所以能“隐忍苟活”，“就极刑而无愠色”，“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即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决心要写成这部巨著的迫切要求战胜了一切勉强活下去时必然会遭受到的耻辱与痛苦。

屈原、司马迁等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说明一个问题，即除了进步思想、正直的品格、对事理的洞察与必要的艺术才能之外，作家本人的创作激情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某种正当的责任感有助于产生创作热情，但如果缺乏深刻的体验，没有某种大痛苦、大悲愤、可歌可泣的东西一直在震撼、激荡，甚至在撕裂着作者的心，没有不把他想要写的东西写出来便坐不住、躺不下，总觉太对不起人，会对时代和历史犯罪的迫切感，光凭一点正当的责任感还是不行。

文学创作必须要有激情，屈原、司马迁以作品的巨大感染力量证明了这一点，东汉的王充在理论上也早已多少看到这一点。王充说：

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论衡·超奇》）

这里说精诚由中而言，感动人深。光凭博览和习熟的人，写不出这种文章来。比起“发愤”而作来，仅仅“精诚由中”也许还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精诚由中”而又感觉非写不可的东西，人们读起来就更有力量了。王充这段话，指出语不精诚便不能动人，只凭博览与习熟写不出夺人肝心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

前人的成功之作和符合艺术规律的议论，以及父亲苏洵对他的教育、启发，使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进一步的总结。这就是他的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

说。

原来苏洵曾这样说过，大概苏轼从小在家里即常听到父亲这样一类的议论：

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此天下之至文也。（《嘉祐集》卷十四《仲兄字文甫说》）

后来苏轼结合他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加以发挥，这样说：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非勉强所为之文也。

（《江行唱和集叙》）

比较一下，苏洵的话诚然不错，但他主要的意思在于说明不能为作文而作文的道理，“天下之至文”只能出于有激而抒和有感而发。而苏轼的话则更为明确，指出古人的好文章，都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作家有了深刻的感触，觉得“不能不为”，不为就“不能自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好文章既不是脱离生活，挖空心思硬造出来的，也不是单凭一点文字底子，写作技术，就写得出来。

从“言必中当世之过”，到寻求确凿可以疗治挽救的办法，再到具有“不能自己”、“不能不为”的激情，从而达到“救时”、“济世”的目的，可以说，苏轼的创作思想不但符合艺术规律，也是深深体现着古代现实主义精神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轼创作出来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反映现实社会矛盾，如《荔枝叹》一类，并包括那些曾被林彪、“四人帮”手下一批文痞指为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全给抹煞的《吴

中田妇叹》、《山村五首》等在内，尽管他的倾向有时较为保守，有的看法并不全面，但他的作品确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体现了“惜民”和要求改革的思想，是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社会面貌的，并非虚假、勉强之作。他的很多抒情写景之作，也非无病呻吟，对后世读者另有其教育、审美等作用。

我们今天要写真实，文学创作既要干预生活，揭示社会的病态，决不能再搞瞒和骗，同时亦绝不能为揭露而揭露，使读者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以致产生不良的客观效果。瞒和骗是不真实，而不反映实有的光明和前途的大有希望，一样是不真实。我们今天的作家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一定要迸发出“不能自己”的高涨激情，通过艺术方法表现出最强的政治责任感。苏轼虽然是封建社会产生的作家，从他这种创作思想我们还是可以借鉴到不少合理、有益的东西的。

三、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

苏轼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必然会触犯大地主当权派的忌讳，就象改革家王安石那样的当政者，由于阶级的局限，对他的公然反对自己，也未能释然于怀。事实上，在苏轼一生中，由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险毒”（参元祐三年十月《乞郡札子》）。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种种排挤、打击的危险、痛苦面前，他不是没有畏惧、矛盾和动摇过，他说过一些懊悔的话，也向有些人表示过再不写诗作文讥诮时政了，然而他终于没有真这样做，他实在禁

不住自己，还要这样说。尽管他所指摘的“当世之过”中有不属实、理解片面的地方，但总的说是苦口婆心，想改善一点老百姓的不幸处境的。可是他的命运却是几番起落之后，垂老还被贬逐到遥远的海南岛，以后幸得生归，没多久便在凄凉的境遇中死了。陆游把他的一生只用四句话总结得颇好：“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帖》）

苏轼所以能在创作上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的现实主义进步思想，自然同他所处的阶级地位有关系，但同他具有比较远大的志向和不念念于一身穷达的正直品格也有密切关系。须知当时同他处于一样阶级地位的人，很多并没有或并未能坚持他这样的创作思想。

苏轼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当然要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但他想要做的忠臣，和别别人做成的完全奴才式的忠臣，是迥然有别的。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说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真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他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称颂韩愈的功绩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修韩文公庙记》）韩愈在多大程度上当得起他这种称颂，可以讨论，苏轼论人的观点却是如此。他论孔北海，论诸葛孔明，称赞张安道，也可以看出他自己想做怎样一种人：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郝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资，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